

東亞文

上自  
觀考  
察古  
學

東  
亞  
文  
明  
之  
黎  
明

濱田耕作原著  
張我軍意譯

北平輔仁大學印



0382

2058  
3652.1

1677  
✓

自考古學  
上觀察

# 東亞文明之黎明

文學博士

濱田耕作原著  
張我軍意譯



## 一、序 言

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群島，以中國為中心，由天然的地形上，自古以來，形成着一個親密的的文化團體，我們姑稱之為東亞文明。這個東亞文明，如何發生？而文化是依何種徑路，波及這個團體的各部？又其年代如何？關於這幾個問題，欲求充分的結果，固須俟諸將來；不過近來，因各種自然科學，文化科學，尤其是考古學的進步，由從事這些學術之研究的學者，這些問題已逐漸解決了。換言之，逐漸獲得科學上的根據，而就解決之緒者頗不少；問題的解決，雖是不甚充分，而且含糊，但是關於『東亞文明之黎明』的研究本身，總算可以說是進入黎明期了。因此，此刻因為資料的缺少而不敢確斷的假定說，也許將逐漸獲得豐富的證據，增加進一步的確實性。至於誤謬的推測，即使行將被破棄，但是正確的見解，也許將從那裡引出來罷。我在下面，就是要從考古學上，就東亞——以中國為中心，及於朝鮮和日本——文明之源流，極簡單地說一說，究竟根據現在學術上的成績，能夠加以什麼樣的觀察，尤其是我自己的見解如何？

## 二、東亞之古石器時代

人類文化之『自然發達』的歷史，經過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等所謂文化三時期，不僅歐洲如此，則在亞洲大陸，大體上也可以照樣說。固然，並非沒有不經過青銅期，就進入鐵器時代這種稍屬變則的發展；不過

人類，在不懂得使用金屬器以前，曾有使用石製利器的時代，這就從現在的事實考之，也殆不容疑問。

那麼中國，在周漢時代的完全的金屬文化尚未出現以前，倘若中國不是無人之地，石器時代的文化大約也存在於中國，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推測的；至於製造這種文化的人類，是否漢民族，姑置勿論。不但如此，近年學界頗有一種傾向，欲在亞洲大陸的高原地方，即從中央亞細亞到蒙古一帶，尋求人類初現地，此益足以使我們希望得人類最古的遺物於中國了。換言之，歷來的學者，多欲求之於歐洲西部地方，或其他地方；現在有力的學說，則謂人類以至更其古的一切巨大哺乳動物的發源地，大約不是在森林地，應該是在乾燥的高原地方，即中亞蒙古地方等處。例如美國奧斯本博士，(Henry Fairfield Osborn)，便是這一派學說的代表者。兩三年來，甚而遣送大批探險隊於蒙古地方；安得思 (Roy Chapman Andrews) 等一班學者，已經陸續得了偉大的結果。這次探險的結果，還沒有發見人類祖先的遺物，這是一件可惜的事；但是據說頗有些遺物，足以支持人類初現地在中亞地方之說。總之，亞洲大陸中接近中國的中央亞細亞，被認為人類發跡地，這在我們是頗饒興趣的話(1)。

人類初現地在何處這個大問題姑置勿論，我們現在應該考查下面這個問題：最古的人類文化，即石器時代中之古石器時代，在歐洲各地已經發見很多遺物了，然而在中國有沒有這時代的遺物？所謂古石器時代，是人類和那些已經絕滅，或更換了棲息地的哺乳動物同時生存，而使用了最原始的，不加研磨的石器的時代；據推想，至少也在二萬年以上。可用以證明古石器時代人類存在的遺物，到幾年以前，在中國附近一帶，完全不為人們所發見。不過我在以前的論文曾經說過：此刻雖尚未能發見古石器時代的確實遺物，但是不唯絕不能說，在那廣大的學術上的未開地，將來不會發見；則自理論上說，也不能否定其存在；事實上，古石器時代的遺物，這幾年來已經一點一點出現

於中國附近，這實在令人又驚又喜。

即一八八六年以來，早經撒梵科甫 (Savenkov)，得肯 (De Bay) 等人，在中國西北端西伯利亞葉尼塞河 (Yenisei) 上游米嫩斯克地方，發見了類似冒斯提期 (Mousterian) 或奧里那克期 (Aurignacian) 遺物的古石器；而其地層與共存動物的狀態，也於一九二〇年為麥哈特 (Merhart) 所證明了(2)。其次為一九二三年，法國學者李森，德日進兩師 (E. Licent, Teilhard de Chardin)，在中國陝西省北部奧特斯地方，發見確實的古象和犀等動物遺骨以及約係冒斯提期或奧里那克初期形式的石器，這不可不說是最重大的事件(3)。再次，安得思探險隊中考古學方面的專家納爾遜 (Nils G. Nelson)，在戈壁沙漠 (Desert of Gobi) 中，發見冒斯提期的石器；據說還有更古的石器，類乎阿史爾期 (Acheulean) 的(4)。(最後這項戈壁發見品，去年我在倫敦時，曾蒙納爾遜氏指給我看。) 由於最近這些發見，我們至少可以知道這樣一件事：在悠遠的古代，中國北部以至蒙古西伯利亞北方，有製造類似歐洲古石器時代中後期冒斯提，或奧里那克期石器的器物的人類居住着。不過這個人種，並非像古石器時代前期人類那樣古的人種，顯然是屬於現存人類 (homo ticens)；但那不是漢民族的祖先，不消說容易不能明白的。然欲謂其絕無關係，則又更不能斷言的了。至於日本，朝鮮，雖尚未發見這時代的遺物，但是在理論上，將來絕不是不會發見的。

註：參考書僅舉最易得者數部於下：

1. Osborn : Man Races to Parnassus, Critical Epochs in the Prehistory of Man. (1928)
2. Merhart :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in Siberia;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Yenisei Region, translat-

- ed by Mac Curd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1923)
3. Licent et Teilhard de Chardin : Le Palaeolithique de la Chine. (L. Anthropologie, 1925)
  - Boule, Breuil, Licent et Teilhard : Le Palaeolithique de la Chine. (1928)
  4. Nelson : The Dune Dwellers of the Gobi. (Natural History, 1926)
  - Andrews: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1926)

### 三、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及其人種問題

中國古石器時代遺物，一如上面所說，最近已經明白起來了(1)。然則到了新石器時代以後的情形如何？這個時代，發見的遺物既相當豐富，而且不僅是中國，朝鮮，日本也有，在亞洲各地，也分布甚廣。況關於新石器時代的智識，文獻上早有遺文，而考古學上，也早在二十年前，就逐漸明白了。即勞費爾 (Bethford Lauffer) 等人在陝西，山東等地蒐集的研磨石斧之類(2) (其中也有很多有孔石斧)；羅振玉氏在河南彰德府殷墟，與骨牙製品同時發見的研磨石刀之類。其次，遼東半島方面，有馮居博士，又有我們，在老鐵山附近和貔子窩等地所調查研究的遺跡與遺物(3)；這些都是以前就比較為人們所知道的重要之例。近年又有瑞典人安德孫 (C. G. Andersson)，在奉天，河南，甘肅等處，發見新石器時代以及從此時代到金屬時代的過渡期的，相當重要的遺物。又如前述納爾遜氏，在蒙古戈壁沙漠，發見古石器時代遺物之時，也發見了新石器。諸如此類，已有確實的證據，證明人類在新石器時代，佔據着中國的中央部以至西疆東邊各地了。

從科學的基礎上說明人類經過三段的發達，即自使用石器至使用青銅器，鐵器，是丹麥的學者們，在十九世紀

時代倡始的。但是這裡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在大約是漢代的書越絕書裡面，楚王與風胡子的關於鐵劍問答中，已有一種『三期觀』了。風胡子說：太古軒轅，神農，赫胥之時，兵器以石作，黃帝時以玉作，至禹之時以銅作，今則作鐵。漢德博士 (H. H. D. ) 和林泰輔博士等，即以此為證明中國有石器時代的材料。固然這種議論的根本，也許有相當歷史的根據，但是我們此刻，不能直以此證明中國的石器時代。我們只能依據事實上的考古學的資料，用科學來考察。然則試想一越絕書裡面這段話，可知此刻在中國發見的石器，不消說是中國人祖先所用的了。但是我們從考古學上所觀察，是否與此一致？下面要加以一番考察。

元來勞費爾氏所蒐集的石器，不是得他自己之『學術的發掘』的結果，所以在學術上沒有多大價值；唯據他所說，此等研磨石斧，是從中國人所認為周代的古墳發掘的。其中有孔石斧居多，其形酷似周代所用『圭』這種石器，有的並且完全與『圭』一樣。所以無論如何，應該認為中國人即漢民族自己所製造使用的，這才是自然的看法。而且除了『圭』之外，還有所謂『璧』這種有孔圓板狀玉器，也應該認為使用石器的遺風，一如林博士和漢德(4)博士所說；不但如此，如後面要詳說的河南省殷墟發見的石刀，與骨鏃和角器同時出土，自其製造方法言，大約是金石并用時代之物；這也應該認為漢民族祖先的遺物，纔是最自然的見解。不過我很詫異，為什麼勞費爾氏儘管承認陝西的石斧等物和玉斧的關係，却又不肯推定中國有新石器時代——尤其是使用石器的時代(5)？

其次，安得孫氏是就實際的遺跡加以調查，而且實行發掘，故其考古學上的結果，較勞費爾氏為有力。關於他的發見品，我要特別在下節詳說，不過這裏簡單說一說，例如他在河南省滎池縣仰韶村發見石器，而證明石斧之中，特是有孔石斧，石環，半月形或長方形石刀之類，是中國石器的特色；他還注意與此等石器同時出土的瓦器，認

定以所謂高這種器形為代表的單色瓦器，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所特有，而謂具有這種文化的人種，乃是中國人的祖先

『原中國人』(Proto-Chinese) (9)。

我們再看一看山東，南滿洲等中國邊境之地所發見的石器，依然與陝西一帶所發見的石器一樣，也有有孔石斧之類；自全體看去，我不能承認其有任何特異點。然而學者中，竟有以發見日本，朝鮮與其他太平洋沿岸多有的有孔石斧之類這件稍屬特別的現象為理由，即認為這大約是漢民族以外的人類所遺留的。如鳥居博士，即認為這是從黑龍江附近蔓延到南滿洲，山東一帶的通古斯族(Tunguses)，即肅慎氏的遺物；而以為往古居住山東的靺夷，萊夷之類，無非就是這個通古斯族(7)。不消說這種見解，的確也是一種看法；但是我們要問：(1)為什麼會在南滿洲之地，發見和陝西等地一樣的有孔石斧之類呢？(2)為什麼瓦器之中，也會發見那種多半是中國文化所特有的鬲形瓦器之類呢？(3)而且我們，難道就不能承認漢民族，早已蔓延(Expansion)於此等地方，一如推想通古斯族之蔓延於山東以及遼東諸地那樣嗎？再則，也無須拘泥於靺夷，萊夷等等字眼。我以為居住中央的漢民族，並非不會有視那些居住邊鄙之地，文化落後的同種民族為夷狄的事。我相信山東，遼東的石器時代遺物，大約還是漢民族的祖先，即安得孫氏所謂的原中國人所遺留的。我以為猶之乎通古斯族之分布於遼東半島和山東等地，漢民族也在漢武帝的大征服以前，即從有史以前，就有人種的波動，而蔓延到此等地方；或者兩人種消長之間有一進一退，這其間也許發生兩人種的混血。而自上述中國式有孔石斧和鬲形瓦器之存在看去，無論如何不能謂其與漢民族及其文化無關，所以一如此刻所說，大體上是漢民族所遺留的。他們以狩獵漁撈為生，結小部落為居，及後乃經營簡單的農業(hoe culture)，此試考其遺物亦可得而知。然則這個新石器時代的年代，開始自何時？那是容易不能推測的。不

過大約  
代，我

頁次	器物名稱	出土地點
第一二二頁	Telipari	Telipari
第一二二頁	riens	riens
第一二二頁	riens	riens
第一二三頁	China	China
第一三三頁	Penang	Penang
第一三三頁	Skolel	Skolel
第一三三頁	raon	raon
第一三三頁	Objets de laz	Objets de laz
第一三三頁	enaravod	enaravod
第一三四頁	Yaula	Yaula
第一三四頁	exhibition	exhibition
第一三四頁	exhibition	exhibition
第一三四頁	Monument	Monument
第一三四頁	China	China
第一三四頁	greco-poudhique	greco-poudhique
第一三四頁	München	München

石併用期的時  
前三四百年。

有如此分期的

學。東亞考古

安得孫氏所發

見的遺物。最初的發見，是一九二二年在河南省滎池縣仰韶村；第二年又從奉天省錦西縣沙鍋屯的洞穴發見；第三年又從甘肅省青海附近，發見很多。出土物除石斧，石刀和石環外，又有瓦器；同時又有極少數金屬器出土。安得孫氏認為這是從新石器時代到金石併用期前後的時代之物。那裡面的瓦器，除黝黑粗製的單色瓦器外，又有所謂彩

定以所謂高這種器形為代表的單色瓦器，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所特有，而謂具有這種文化的人種，乃是中國人的祖先

『原中國人』(Proto-Chinese) (6)。

我們再看一看山東，南滿洲等中國邊境之地所發見的瓦器，依然與陝西一帶所發見的瓦器一樣，也有有孔石斧之類，黑龍江之類，

洋沿岸多有的有孔石斧，即認為這是從東的嶠夷，萊夷什麼會在南滿洲化所特有的高形想通古斯族之蔓族，並非不會有還是漢民族的祖漢民族也在漢武進一退，這其間民族及其文化無經營簡單的農業不能推測的。不

頁及行數	誤	正
第二九頁第五行	Teihard	Teilhard
第二九頁第十一行	ricens	recens
第二九頁第十五行	rices	rises
第三十頁第三行	China	Chine
第三十六頁第八行	Fengt-	Feng-
第三十六頁第八行	Skeleal	Skeletal
第三十六頁第三行	tson	ts'un
第三十七頁第八行	Object de lux	Objets de luxe
第三十八頁第九行	endraved	engraved
第四十四頁第十行	Yettls	Yett's
第四十四頁第十行	expediton	expedition
第四十四頁第九行	Scythien	Scythian
第四十六頁第八行	Mounment	Monument
第四十六頁第二行	China	Chine
第四十七頁第五行	greco-bouddhique	greco-bouddhique
第七十一頁第七行	Münlchen	München

### 勘 誤 表

過大約總不至太新，一如一部分史家所說那樣；至少也應該在西紀前數千年。這個時代告終，而入金石併用期的時代，我以為在中央部大約是所謂殷代，即西紀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在邊鄙之地，大約是周末，即西紀前三四百年。

註

1. 有一種學者，於古石器新石器之間，置中石器時代 (neolithic age)，但是我們在這裏，沒有如此分期的必要。Lauter: Jade. (1910) 及其他。
2. 參照鳥居龍藏博士南滿洲調查報告 (明治二十四年)。八木井三郎君滿洲舊蹟志，滿洲考古學。東亞考古學會編獅子窩等。
3. 林泰輔博士自中國上代的石器玉器觀察漢民族 (史學雜誌第三十編)。
4. 濱田耕作有竹齋古玉譜中中國古玉概說。
5. 參照次節安得孫氏等著作。
6. 鳥居博士南滿洲調查報告 (前出)。
7. 四、彩畫瓦器與西方文化之關

這裡又於中國新石器時代以至其末期時代的遺物之上，增加新資料與新見解，即上面曾經提過的，安得孫氏所發見的遺物。最初的發見，是一九二一年在河南省滎池縣仰韶村；第二年又從奉天省錦西縣沙鍋屯的洞穴發見；第三年又從甘肅省青海附近，發見很多。出土物除石斧，石刀和石環外，又有瓦器；同時又有極少數金屬器出土。安得孫氏認為這是從新石器時代到金石併用期前後的時代之物。那裡面的瓦器，除黝黑粗製的單色瓦器外，又有所謂彩

畫瓦器(Painted Pottery)，即在紅色地上用黑色畫紋。(1)其單色瓦器，與滿洲方面所發見石器時代的瓦器，以及漢以前的瓦器，似無大異。唯此種彩畫瓦器，形體極優美整齊，全體形狀，頗不像中國之物，反有西洋臭味，一見也頗像美洲土人的瓦器。如其欲於舊大陸求其類似，則有美國勞費利(Pamphelley)探險隊斯密特博士(Hubert Schmidt)，由土耳其斯坦安惱(Anau)發見的瓦器，和斯泰因博士(Stein)在栖斯坦(Saisian)所得瓦器；而又與南俄的黎波里(Tripolije)的瓦器類似。此外又與蔓延到波斯蘇撒(Susa)，巴比倫尼亞(Babylonia)地方，或羅馬尼亞庫庫德尼(Cucuteni)等地的彩畫瓦器，也可以看出類似點。

那麼彩畫瓦器，或此時的中國文化，何由而發生？換言之，這種瓦器或文化，是隨從具有這種瓦器，文化的人種，從西方進來的呢？或者是僅僅其文化技術，受了西方的影響呢？這是當然要發生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發見者安得孫氏早就立說，謂這大約是具有和生產彩畫瓦器的西方各地一樣的文化中原中國人(Proto-Chinese)，當新石器時代從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動到中國西疆，入了甘肅，而終於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瓦器的。同是瑞典人語言學者阿羅佩倫(Karlgren)，則謂中國人在產生這種彩畫瓦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製造了鬲式三代瓦器；至於彩陶文化和牠的民族，是後來從西方流入的(2)。其次，亞惱瓦器的發掘者斯密特氏，比較以的黎波里等地之物為代表的西方群，與亞惱，蘇撒等地之物為代表的東方群，而謂中國這種彩畫，寧可以說是類似西方群；於是主張這是西方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從北歐和東南歐傳入中國(和日本)(3)的。

安得孫氏所發見的甘肅瓦器，我除了中國北京大學所收藏者外，去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時，得見其大集成，親聆安得孫氏的說明。他將其分成六期，其時代與後面要說的斯基亞(Scythian)文化有關。他的人種說

，雖似有多少特別，但總之，這種中國的彩畫瓦器和西方的彩畫瓦器有關係，這除了法郎克福特(Frankfort)外，大約是多數學者所不欲加以懷疑的了。最後，我將安得孫和阿羅佩倫兩說比較，反而覺得阿羅佩倫說較善。依我的意思，中國人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已經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畫瓦器的文化，隨同新人種侵進來。與瓦器同時，在河南，甘肅，奉天等地為安得孫所發見的人骨，據布拉克氏(Davidson Black)的研究，說是可以認為原中國人的(4)；然則此人種文化的流入，並沒有達到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的血液的程度；反過來說，是外來的要素，不久即被同化的了。而且西方人種文化之流入中國，有史以後也屢出，彩畫瓦器大約是有史以前，人種文化的波動最顯著的一例。安得孫氏以此彩畫瓦器文化的時代，為西紀前三千年左右；但這似過於古，不能相信。不過我以為其最終期，大約總在周末時代。

這裡順便要說一說關於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即歷來為學者所議論的中國人種文化西源說。(5)柯伯利(Terrien de Lacouperie)在自今半世紀以前，就提出一種意見，說漢民族的起源地在巴比倫尼亞，黃帝是統率Baku族(百姓)東征的人。李希陀芬(Richthofen)說是從西域于闐地方西移。又在約畧十年前，波爾(Ball)說巴比倫尼亞古住民蘇美爾人(Sumerians)，和漢民族是同一幹的分枝。此等諸說，大都以語言文字的比較等等為根據，欲將後來的漢民族，直與西方歷史上的民族結合；自學術上看去，可以說是根據薄弱之說。不過中國人，在人種上或文化上，與西方有密切的關係，這已如上面所說，從考古學上也可以證明。

我在這裏又要提出一件和東亞文化沒有直接關係的事，就是兩三年前，發現於印度西北地方，而為舍斯(Schaefer)博士等人所注意的原尼拉姆(Proto-Eramite)印象文字。這確是證明巴比倫尼亞文化與印度西北地方文化接

近的明證，而其彩畫瓦器，也可以使我們覺得和中國所發現的，有多少關係。然則我們，已經不得不承認世界文化，自悠遠的古代，東西已就互相發生關係的了。

註

1.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 Geol. Surv. China, 1923) The Cave Deposit at Sha-Kuo-tun in Fergatien. (Pal. Sinica, 1925);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n. Geol. Surv. China, 1925); Arne,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Pal. Sinica, 1923)
2. Karlgren: Andersson's Arkeologiska studier i Kina. (Litteris, Vol. I. No. 2)
3. Hubert Schmidt: Prehistorisches aus Ostasien. (Zeitsch. f. Ethnologie, 1924)
4. Davidson Black: Human Skeletal Remains of Sha-Kuo-tun and Yang-shao-tsun.
5. 此項參考書過煩，恕不舉。

#### 五·殷墟遺物與金石併用期

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開始自何時，這是不易確言的；不過一如上面所說，在中央部大約是從殷代，漸漸開始使用少數銅器，而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即所謂金石併用期了。我的根據，即以殷墟遺物為主。殷墟在河南省彰德府安陽縣小屯子附近，據說此地是殷盤庚以後建都之地。自一八九九年以來，就發見遺物，而稍為以充分的形態介紹到學術界的，可以推羅振玉氏。

其遺物，有石器，骨器，瓦器，青銅器，並且有刻着文字的獸骨。唯尙未經過『學術的發掘』，故關於遺物的『層位關係』等，還有不明瞭的地方；但總之，其所貢獻於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之功，不可不謂大。石器中有長方形或直方形石刀，又有石斧。自其製法看去，令人可以推想他們在另一方面，已經開始使用金屬器，這是一如舍斯博士所說的。而且事實上，也出土若干銅器的破片之類。骨器中有骨鏃，骨筭之類，後者頗有點類似埃及王朝以前之物的地方(1)。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有一種象牙，獸骨的裝飾品，和白色瓦器，上面彫着饕餮雷紋系統的紋，這紋式和三代古銅器的紋式完全一樣。關於這種白色瓦器的用處，自不能認為殷人當作日常什器用的瓦器。大約日常的瓦器，只有像新石器時代那種單色粗製之物，或帶繩線紋的棕色或黝黑之物。於是有的推測道，這大約是王侯貴族所用的，不然就是用於祭祀的特別器具 (Object de lux)，而用精良的陶土製造，即以代象牙；有的又認為這大約是用以作銅器之原型(2)者。這裏不必深加討論，總之，如果一如上面所說，有極少的青銅器，和石器骨器存在於同一層中，又如果這個地方確是殷代都址，那末我們就可以推測，當殷代即西紀前一千二百年左右，至少中國民族的一部分，是已經從新石器時代移入青銅器時代的了。

其次，殷墟遺物中，重要的是刻着文字的獸骨。其實羅氏等中國學者之注意這些遺物，也是爲了這些古獸骨文字(3)。這些獸骨，是牛骨，龜甲，爲供卜筮之用的。據羅振玉等人的研究，其主要內容，是關於祭祀，田獵等。我們據此，可以明白當時的宗教思想，以至種種社會生活的狀態，實可謂爲中國古代文獻之最古者。據說那些文字裏面，又有配合于支的殷代帝王之名(4)。但是有些學者，頗疑其僞。理由是說，這些骨板上的文字，是簡單的『線的』文字，而商周銅器的銘文，反屬『畫的』，這是不自然的；此外又有從紀年法上致疑的。(5)然而埃及的畫



文字以前，也有更其古的「綠的記號」，又有畧字與畫文字同時存在，所以這不足為懷疑的理由。我會親見其發掘地，再自最近董作賓氏試掘的結果推之，也斷不能認為偽品。不過後來有偽品的販賣，却是事實。

總之，殷墟雖有未經充分的學術調查之憾，但其遺物之大部分，不妨認為周以前之物；而且可以說是由此，發見了接銜中國古典時代和先史時代的一件連絡品了。自這一點說，我認為殷墟的發見，可以和斯利門的發見併稱——斯利門的發見，是最初使希臘古典時代與先史時代接銜的。

註

1. 羅振玉君殷墟古器物圖錄。林泰輔博士關於殷墟遺物之研究（東亞之光第十四卷）。
2. 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1927) 參照第二章參考書。
3. 濱田耕作中國古銅器研究的新資料，相傳為殷墟出土的象牙彫刻與土器（國華第三七九號）。
4. Hamada: Endraved Ivory and Pottery found in the Site of the Yin Capital. (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t. of Toyo Bunko, No. 1, 1926)
5. 內藤虎次郎博士王亥（讀史叢錄）等。
6. 劉鐵雲鐵雲藏龜。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考釋等。一九二八年董作賓氏的試掘，獲骨板二十點，中有字七百個。
7. 飯島中夫君中國古代史論（東洋文庫論叢第五）等。

### 六、中國青銅器之極盛期

依上面所說殷墟遺物的證明，中國大約在殷代，已自金石併用期移入青銅時代了。這個青銅時代的文化，約畧經過十世紀，到了周代，其文化遂登峰造極。周代古銅器，即其明證（一）。現在以殷末周初為西紀前十一世紀，周末為三世紀，那末中國的青銅時代，便較諸西方各國遲緩不少了。埃及方面，新帝國滅亡於殷之中葉；西亞洲方面，亞西里亞國已到末期了。僅有希臘米開涅（Mycenae）文化，自殷繁榮到周初，此時中國可巧也達到青銅時代文化的極盛期，而終於造出那麼完全的銅器；但是這不足以為奇。也許有人說，周代銅器之類，一般不會如此之古，但那是因其不明這種世界大局而生的誤謬。

接着又要發生這樣的問題：這種銅或青銅的使用，是單獨發生於中國呢？或從某一個中心地波及於中國呢？這個問題，已有種種議論，而事實上也還沒有研究成功；不過我以為，至少在舊大陸，是發生於西方亞細亞的一個中心，傳播到各地的。一如上面所說，早在新石器時代與西方有不少的文化上的關係，然則關於銅和青銅的智識，就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也是大可以有的事——我們此刻雖尚未能明白其路徑。我的意思只是說，使用銅，青銅的智識傳自西方，後來自然是在中土自行採銅的了。倘若中國不自行產銅，而須從外國輸入材料，那就絕不會出現那繁盛的青銅文化了。上代中國，南方吳國以丹陽銅山著名；而且青銅合金成分的錫，也在中部中國生產很多，所以要製造青銅器，是非常之方便。

歐洲青銅器時代，普通都屬於有史以前，但是中國，已如上面所說，既有殷墟的骨甲文，到了周代——尤其是周之末葉，又有相當豐富的文獻，所以這時代的制度，文物，無須依據考古學的資料。不過因為有精巧的手工製造的

銅器遺物，所以從考古學上的研究，亦能設想其文化發達的程度。這些銅器自異乎瓦器之類，不是日常生活上的器具，頗足令人設想王侯貴族的社會成立，而宗教祭祀也已經確立，可以說是和周禮，禮記等文獻的資料並行的文物表象。

在周代達於全盛的中國青銅器，自殷時已有若干，一如上面所說，但可惜，我們此刻不能知其與殷（商）銅器之間有多少差異。唯其與周末至漢之物大不相同，這是可以知道的。其器物之形與紋，以周代為中心形成一個完全的樣式，把中國固有的特質發揮無餘。即新石器時代的鬲形瓦器，至此被用以作銅器之形，成為完備的鼎，而與『甗』結合的『甗』（從南滿洲魏子窩出土（2），一變而成銅甗而完成之；此外又出了尊，敦，卣，匜，鐘等具有種種特徵的彝器。又如陝西省寶雞縣出土的『柶禁』一具，以及近年在河南省新鄭孟津二縣發見的銅器羣，尤其值得注意。此等銅器所用的紋式，和殷墟的骨片和白色瓦器上的紋式，是完全一樣的動物紋而表示充分的發達。關於這個動物紋（animal style）的起原，有些學者謂其與西方有關係；但總之，中國在周代，有了一種特別的發達，異乎別的地方，於是成了所謂饗餐紋，虺龍紋之類，而地紋則特別好用雷紋。有以為饗餐，大約就是有僻邪之意的邪視（evil eye），但我以為其起原，大約是人面模樣。虺龍不消說是爬蟲類的紋。

註

1. 考古圖，博古圖錄，西清古鑑等。又有著錄住友男爵藏品的泉屋清賞，和端方的陶齋古今錄等。

2. 參照東亞考古學會編魏子窩等。

### 七、鐵器之使用與秦式藝術

鐵器在中國，是從周末逐漸出現，至漢而完全移入鐵器時代的。此固無確證，但是文獻方面，也有相當依憑，再以鐵器不會至漢忽代銅器而出的理由，也可以這樣推測。如是一方面出現鐵器，關於銅與青銅的價值與見解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中國自周末到春秋戰國，思想開放，哲學，文學方面，造成可驚嘆的時代；反之，和平之產物的美術方面，自不得不墮落了。至少在漢代古典美術崩壞，而新美術尚未形成以前，只能認為繼續墮落衰頹的狀態的（其青銅的品質，普通也好像變成粗而薄）。這個過渡期，本不必賦與特別名稱，若強欲名之，歐洲學者所用的『秦式』雖稍有不適之點，但還可用。我們向來都將其附於漢代之末，或攝入漢代處理，但是近來資料稍加豐富，故特分別處理，作為秦代遺物在這裏說。

其主要資料之一，是法人瓦涅克（Wamneck），數年前從山西省大同附近一個城牆內（還有漆器，所以或說是墳墓，或說是祭祀，或說是藏匿），發見二十餘點銅器；相傳這是始皇二十八年巡狩各地，祭祀山川時物。器之形與紋，也可以認為周漢之間，恰是秦代之物。我曾親見其物，大體上的形式，寧可以認為漢代銅器。器上之紋，是改變周式的一種變形雷紋的平板的表面裝飾，以前那種凹凸的浮彫式地方已完全沒有；宜於認為周漢間過渡期之物，故稱為『秦式』，毫無不可（1）。此說出後，歷來被當作極古形之漢鏡，即鏡上附以淺的雷電紋的鏡，此刻也有人承認其為秦鏡了。

秦起自西戎，人種上與文化上都與西方蠻族大有關係。當秦國勃興的周末戰國時代，北方西方民族，跟着中國政治組織之崩壞而盛行侵入中國，這是不能免的。戎狄之侵入，後來屢次出現，一方面破壞中國的文化，一方面又灌輸新血液於中國民族，使中國振作精神，這也是不能否定的事實。從而自這時候以後，服飾之類，也傳播所謂北

狄的胡俗於中國，六朝以後遂風行中國了。其於周末經秦而漢（或其以後），雖不至搖動中國文化之大勢，但也形成一種顯著的文化，藝術的要素了。關於北方民族所及於中國文化的影響，為西洋學者新近開始研究的問題，我在下面想說一說。

註

1. Tizac: L'Art Chinois. (Paris, 1926) 等。

八、所謂斯提亞文化及其影響

自周末漢初即大行影響於中國文化的北方民族，多半是土耳其民族，但尚不至造成他們特有的文化；而影響最大者，大約是當時行於亞洲北部的伊蘭（Iran）系統的文化。這種文化，總稱之曰斯提亞文化（Scythian），或斯提亞，西伯利亞文化。其發源地雖尚未能充分明白，唯自己明者說，大約是在高加索山和黑海北方斯地不地方（Steppes）。即在南俄頓河（Don），得尼普爾河（Dnieper）流域，至少從紀元前數世紀前到紀元後約一世紀之間，有一種青銅文化；而佔住此地的民族，雖代有更換，但其文化，始終有特別的地方；此事由於羅斯陀夫折甫（Rostovtchikoff）等一班學者熱心的研究，已成定論了（1）。此地早在新石器時代，即具有所謂「的黎波里文化」；其後伊蘭地方的文化北漸，而成希臘人的所謂息米立亞人（Cimmerians）的時代，繼則成為斯提亞人之世；但是西方希臘文化的影響，在此地也隨其植民而大著。其次，和斯提亞人同種的薩馬提亞人（Sarmatians），於西紀前約二世紀時佔領此地，而到了羅馬時代；但是歷來學者也非常注意希臘文化，對這個斯提亞人國的影響（克里米亞 Crimea 地方的古墳發見品裡面，黃金品特多，而且可以發見希臘藝術的影響）。這且勿論，近來終於有人倡說這樣的意見：

一、他們有特殊的文化，藝術；二、而且確屬特殊的而又大有價值，絕不能謂其野蠻或未開化，一筆鈞銷之。

這個以斯提亞人為中心的文化，發源於伊蘭文化，從而與巴比倫地方的西亞洲文化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他們在遊牧生活之間，產生不少特殊的地方。一言以蔽之，是一種動物紋，特別發達於這個斯提亞薩馬提亞藝術上的。其裝飾之中，有動物鬥爭圖，如動物屈足蹣跚，或猛獸咬馬，又如動物的頭部或肢腳之類，多被用為紋的要素。像羅斯陀夫折甫等人，謂中國商周古銅器上的饕餮，虺龍等動物紋，也和斯提亞藝術有關；兩者至少也是出自共同的母胎伊蘭藝術的。這是一件動聽的意見，而與從前欲承認中國之影響於斯提亞藝術的萊涅凱氏（Reincke），看法完全相反。但是我不能贊成羅氏之說，承認周代銅器等物的動物紋，和伊蘭或斯提亞有特別關係。固然，動物紋和幾何學式紋的結合這種大體上的形式，似乎類似，然而各種要素的類似並不甚著。而且，假使中國那種已經完全式樣化的動物之形，是出自比較屬於寫實的伊蘭，斯提亞的動物紋式，那自不能是直接脫胎的，所以須說明其徑路了。試轉過來看一看大洋洲野蠻人所作木器的彫刻等，那裡可以發見與此相通的紋式（墨西歌馬耶藝術，大約也有類似）；若依說者的說法，這也要歸到伊蘭藝術的一源了。我認爲中國的動物紋式，是與大洋洲野蠻人間的木彫之類同在一個階段，而發達到極度的一例。自當時言，尚未受斯提亞的影響，主爲在中土獨自發展的。

我不過是不承認斯提亞文化之影響商周時代的古典的物品而已，至於自周末至漢，斯提亞西伯利亞藝術，介乎北方民族，及於中國藝術的巨大影響，我是承認的。例如發見自中國的帶鈎的裝飾，馬具的透彫裝飾之類，可以看出動物紋，尤其是獸類鬥爭或交錯的紋式，而且只能認爲斯提亞式。元來這些馬具，革帶之類，便是從北方輸入中國，朝鮮的，所以藝術樣式與其同時移入，也是最自然的現象。不但如此，其特殊的紋式之一致，絕不能以偶合了

之。一九一二年俄人科茨洛甫氏 (Kozlov)，在北蒙塞倫加河上游的古墳，發見許多遺物，中有精巧的刺繡，是用以裝飾墓門的。其紋式，有斯提亞式動物，有希臘的要素。又有中國的成分(2)。又有一種漆器，是中國起原的，其紋式與朝鮮樂浪的發見品完全一樣；中有附前漢建平五年(西紀前二年)之年號者(3)。此外又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中國文化藝術，當時已及於這些邊疆之地。於是我推想道：斯提亞西伯利亞藝術，自周末至漢，從北中國東漸或南移，雖不至推翻中國文化藝術，總算與以巨大的影響；而於各種社會生活——包含衣服，武器及其他——，也有不少影響。反之中國文化藝術之影響西方，也應該考究，但是這裡不必說。其次，在漢代影響中國的，尚有西方文物，或經由中亞，或經由南海；關於此事，次節還要說。

註

1.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1922.) Borovka: Scythian Art. (London, 1922)
2. 除科茨洛甫的俄文報告外，尚有 Yettis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926)
3. 這個年號的解讀，多屬梅原末治君訪俄時之貢獻。

## 九、漢代文化

自周末開始通行的鐵器，至漢始攫取了青銅的地位，此由於發掘漢代古墳——例如朝鮮樂浪的古墳——的結果可知。不過利器以外的器物，漢以後頗久，還用青銅(利器中之鏃，漢時尚用銅鏃，這是為製造的方便等起見)。中國

文物至漢而大發達，有豐富的文獻為證，文學，哲學，史學，等精神方面不待說，在造形美術方面也大有進步。以前僅能造出古銅器等工藝品，至此則多少可以發見建築，彫刻，畫方面的遺物了。那不消說只是當時美術產物的極小部分，遺留在有關於墳墓的石造品，或殉葬的明器上的片影罷了。如山東省孝武山武氏祠的石闕祠堂，或四川省及其餘各地的石闕，石獅之類，也可以明其對於造形美術的努力。不但如此，建築上抖拱之制，已表示和六朝式特徵——此刻日本法隆寺即屬之一同屬一個系統的「空想形」(Tancy form)；而且其後二千年之間，一直支配中國日本等地的建築的抖拱等等的法式，當時已經完成了(1)。又如銅器等工藝品方面，也逐漸擺脫周以來的傳統；其形式既清楚，紋也僅施於一局部。自其要素言，動物紋已不多見，反而好用幾何學式紋式，或渦雲紋，植物紋等。而且盛行製作金銀寶石等象嵌小器，其技工之精巧，到最近尚有疑其為後世之作者。羅斯陀夫折甫氏謂此等也受了撒馬提亞藝術的影響(2)。

這種藝術上的大革命，趣味的大改變，因何而起呢？此固由於周末以來，醞釀於漢民族自己之間的精神變化，但是我們還不得不承認外國文化的影響之力。上述自周末時傳入中國的斯提亞西伯利亞文化，藝術，確為一種強有力的要素；但是此外，尚有許多西方文化的要素。漢至武帝時(西紀前一世紀)，大振其勢力於四方；不待說這是周以來人口繁植，文物成熟於內部的結果，而且不過也是有史以來屢見的「民族的蔓延」的再現；不過武帝時的擴張，可以說是有史以後最初的人種文化的大擴張。其勢力，西至中亞西域諸國，南及安南，東自朝鮮及於日本。其結果，中國文化傳播此等地方，而此等地方的文化，以及他國文化——經由此等地方——，也流入中國，這是自然的形勢。武帝時到西方的軍人，有武帥李廣利，到中亞大宛國(Ferghana)，除軍事目的以外，自然也帶出文化的結果

，例如他帶汗血馬 (Turkoman horse) 回漢，即其代表例子；但是負着更其重要的使命的，是張騫。他是爲與大月氏聯盟，以圖根本覆滅北方大敵匈奴而到西方的。他的目的雖未達，但他所經過的中亞諸國的文化，却被他介紹到中國了。

以大夏 (Bactria) 爲中心的中亞諸國，由於希臘馬其頓 (Macedonia) 亞歷山大王遠征的結果，希臘的文明影響到伊蘭波斯文物之上，而行所謂希臘主義。那希臘的，波斯的文化藝術，經由張騫遠征以後開始的交通，逐漸輸入中國了。依歷史所傳，李廣利帶回的是汗血馬，張騫帶回的是葡萄，但不待說不僅這一點。大約還從大夏等中亞諸國，傳了太秦即敘利亞 (Syria) 似的羅馬領地的地方的文化影響到中國的。葡萄大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原產，而將其與伊蘭地方的動物紋結合，留下撒山波斯馬西達 (Machata) 宮殿石壁上那種大『Moument』。這一面移入希臘羅馬，一面經過中亞而入中國；自六朝末至唐，遂成爲海獸葡萄鏡之類，當日本奈良朝時，也侵入日本(3)。這些影響，遂發生文化藝術上的大革命於漢代，這種推測，當不至有大錯。但是最大的結果，還是後漢時由大月氏輸入中國的印度佛教。其影響於後代東亞精神界，實屬『劃期的』，唯其影響，屬於本文範圍以後的時代，所以這裡不必說。不過這裡有一事不得不說，即受了希臘美術之影響的所謂『根達刺』(Gandhara) 這種希臘佛教美術，發達於大月氏所居印度北方，所以當初傳入中國的佛教美術，也是那種包含希臘要素的(4)；從而日本古佛教美術，也可以窺其片鱗。近年德，法，俄，英諸國學者探險中亞土耳其斯坦地方的結果，這種美術傳播的途徑也明白了。

註

1. 關野貞博士在山東省的墳墓的表飾 (東京帝大紀要)。(Clavannes: Le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a and Seglin: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a. 拙稿中國漢六朝式建築與法隆寺建築的樣式。
2. Rostovtzeff: Inlaid Bronze of the Han Dynasty. (Paris, 1927)
3. Hirth: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拙稿關於禽獸葡萄紋 (國華)。
4. Foucher: L'Art gre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et Grünwedel-Burges, Indian Art.

## 一〇、漢代文化之東漸與南滿北鮮

前漢武帝時代漢民族之人種的，文化的擴張，在漢民族是有史以來的大事件，而在東亞文化史上，也是天大的事件。當時佔據遼東半島以至朝鮮半島的，漢民族與通古斯族等的混合民族(尤其是韓民族)，以及佔據日本群島的日本民族，周末以後纔一點一點和金屬文化接觸，而大體上還處在新石器時代。當此之時，移植金屬文化於此等諸地，使那些民族參加中國文化，遂使其成爲歷史時代的民族；在東亞歷史上，或者不多比此再大的事了。現在我想先就滿洲，繼就北朝鮮的狀況說一說。

滿洲，一如前面所說，大約中國人在石器時代已經移植此地，而其文化也傳到那裡了。但是後來，爲中央文化所遺棄，而彷徨於石器時代；不過中央文化，自周末春秋戰國時又灌入不少，造成漢代文化移植的根基。例如北自奉天、逐漸南下而大石橋，瓦房店，熊岳城，貔子窩，金州，旅順，營城子等地，發現了周末的錢幣如明刀，方足布之類，在在足以證明。

然而這遼東半島之完全享受漢民族文化，而入金屬時代，還是武帝擴張勢力的結果，成爲漢的一郡，而益發大

受人種文化侵畧以後事；而且受了中國化的，大約主爲遼陽以南。遼陽，熊岳城，旅順等地的貝塚，石棺石室之塚，都是這種結果出現的遺物。那裡面出現了許多自前漢到王莽時代的錢貨如五銖，貨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以及漢鏡，漢明器，泥象，漆器，銅器等（1）。古墳中特著者，可以舉出我所發掘的旅順南山里刁家屯的五室甌塚，和營城子的甌塚之類（2）。古墳以外，今年原田淑人君和我們所調查的旅順牧羊城，也是很有意思的遺跡。去年發掘的魏子窩管內碧流河畔的遺跡，乃是石器時代到周末漢初的住居地；其屬石器時代的遺物，有埋葬塚和異乎安得孫的發見品的彩色瓦器。又發見周末漢初之物如明刀，方足布，半兩，一刀錢等，和鬲，甌等瓦器。這是一個重要的遺跡，足以證明遼東半島，在武帝以前就享受着中國文化，造了武帝以後漢民族植民的根基了（3）。北朝鮮，大體上與南滿洲係同一狀態。這裡也是通古斯和中國人等等混合的民族，自古即住着，具有石器時代的文化；其證據是平安南道及其他等處所發見的石器瓦器之類，其文化色彩，大體上是一樣的。雖有殷末箕子入北朝鮮的傳說，但此刻尙不能證以考古學。不過到了周末，交通之迹已明，即在平安北道寧邊，發見了明刀之類。到漢武時，中國文化終於大規模地移植於此，朝鮮北部，成爲漢的領土，分成四郡了。

於是北朝鮮，遂由石器時代或金石併用時代，一躍而與鐵器時代的優秀的漢文化接觸了。平安北道平壤附近樂浪郡故地的許多古塚和土城，以及黃海道鳳山郡的帶方郡故地的帶方太守張撫夷之墓，便是這個漢文化移植的大紀念品。關野博士等發掘的結果，從樂浪的遺跡，發見樂浪太守章，鮮朝右尉，粘蟬長印，邯鄲長印等有字的封泥；而古塚的殉葬品則有銅器，漆器，鐵器等精巧的遺物。漆器上面，飾以極優秀的畫，而且刻着前漢始元二年（西紀前八五）到後漢永平十二年（西紀六九）的年號（4）。這裡還要附帶說一句，即關於中國南方安南的事。法國的學

者，由東京地方發見了和滿洲朝鮮一樣的漢式墳墓，證明着中國文化，也波及於這方面。（5）及漢之政治勢力衰退，北朝鮮方面，在來的朝鮮民族逐漸得勢，終於建立高句麗國；但其文化，也不過是攝取漢與三國，六朝的中國文化，多少將其『地方化』吧了（6）。

註

1. 鳥居博士南滿洲調查報告，八木君滿洲考古學等。
2. 濱田刁家屯一個古塚（東洋學報第一卷）。同人的南滿洲之考古學研究（同上第二卷）。
3. 東亞考古學會編魏子窩（東方考古學會叢刊第一冊）。關於牧羊城，已定於最近之將來出版報告。
4. 關野博士朝鮮古蹟圖譜。同人樂浪郡遺跡（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四冊）。原田淑人，田澤金吾二君樂浪（近刊）。
5. Parmentier 氏論文（法國極東學院報告文）。
6. 關野貞博士朝鮮古蹟圖譜等。

#### 一一、南朝鮮與西日本之中國文化

北朝鮮是這樣地受了中國文化之影響，而終於殆完全爲中國文化圈所包擁；至於南朝鮮情形如何？此地的民族，大約也是通古斯族侵自北方，大約又混之以中國民族，印度內西亞族等，而日本民族也早就移民到此；所謂韓民族即這些民族混合而成的。史傳上所謂三韓，即這些民族的集團；這中間，日本民族的血液，也是重要的重素。他們最初也具有新石器時代文化，證據是南鮮各地發見的石器。這些石器裏面，有帶抉鑿形石斧，石刀，西日本與平安

南道也可以發見此物。石鏃大都是研磨的，和遼東半島通行到西北朝鮮者屬於同一系統，唯日本甚少。由是考之，當石器時代，滿洲一帶和朝鮮半島，人種要素雖稍為不同，但是文化，大體上似乎屬於同一系統（1）。

中國文化之入南朝鮮，雖似稍遲於北朝鮮和遼東半島，但依然是目周末，即有若干交涉；我們由於發見自全羅南道康津的明刀錢可以設想。其交涉至漢而漸繁，此由於出土自慶尚南道慶州和永州以及入室里附近的銅器，可以窺見（2）。然而這還不至變改全體文化，南鮮大約依然彷彿於石器時代末期或金石併用時代，此由於發掘自慶南金海貝塚的，王莽的貨泉和多數骨器，少數石器，鐵器可知（3）。當前後漢之時，南鮮可以說是和殷代的中國中央，處於同一文化階段的了。南鮮是從三國到六朝以後，纔大受中國文化的感化；慶州古新羅古墳遺物，即其巨證。一九二一年偶然發見的金冠塚（4），接着被發掘的金鈴塚，金鞋塚，以及後來發掘的瑞鳳塚——從此等塚裡掘出六朝式帶耐寒圖和蓮花紋的附柄香爐，和帶着藻紋的帶金具，以及腰佩之類，其年代絕無疑問。這種藻紋，源出阿爾泰伊蘭地方的文化，由西伯利亞蔓延到東歐，而在阿爾巴尼亞（Albania），也可以發見紋式相同的金帶具。我以為除了中國中央以外，尚有斯提亞西伯利亞文化，不經由中國，而從北方亞洲傳入朝鮮。從那些古墳，又發見了玻璃器，這不消說是西域交通的結果傳到中國的。南朝鮮是這樣地大受六朝的中國文化的影響，同時也應該知道有日本文化的痕跡。慶州古墳的遺物，又有很多黃金小器，正與南俄斯提亞會長的墳一樣，證明南鮮貴族王者之愛好豪奢，與其趣味之低級。總之，南朝鮮之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稍遲於北朝鮮，故多多發揮其地方色彩；然自六朝至唐，也終於被擁入中國文化圈之中了。而且在六朝時，居然與北鮮並駕齊驅，發展至於能造成三國鼎立的形勢了。

再說西日本，其受中國文化之影響，似與南朝鮮殆由一樣的途徑。唯證明漢以前與中國交通的遺物，較南鮮更少，僅有明刀錢出於備前三原町附近這件不大靠得住的事實，和琉球的貝塚有所發見的報告。此外又在近畿東海等地，發見了所謂銅鐸；這大約與漢以前，尤其是與南中國的銅器有關，而經過日本改變一下造出的。及漢，則有九州發見的漢倭奴國王印，漢式銅劍，鏡，玉璧等物，而又於九州和山陰發掘王莽貨泉，故能於中國史籍上記載以外，依考古學的遺物證明交通。其交通，介乎朝鮮者固多，而直接的交通，大約也有。而且這些貨泉，是和石器時代末期，金石併用期的遺物同時發見的；所以西日本，當王莽時代，大體上是石器時代末期，而受漢文化影響的結果，纔移入金屬時代的黎明期。然而這個漢文化，是鐵器時代的文化，所以雖是輸入了銅劍之類，大體上却是鐵器時代的文明。因此，日本就是和南朝鮮一樣，從石器時代一躍而入鐵器時代的了。

漢以後到六朝，和中國的交通漸盛，從日本古墳中發見很多漢六朝之鏡，這是強有力的憑證。而且這時的交通，大約是直接而不經由南朝鮮。其理由之一，是日本古墳所出那種漢六朝鏡，南朝鮮極少；而中國史書也有明文。即魏明帝景初二年，贈倭女王卑彌呼以刀鏡；同廢帝正始元年也有一類之事見於三國志。再據宋書，日本允恭，安康，雄略諸天皇，曾遣使到南宋，所以如鏡之類，大約是由中國南朝輸入的了。不消說尚有中國文物，經由朝鮮，間接傳到日本的，大者例如文字與書籍，繼有佛教。除此以外，還須考慮非中國式文化之傳入日本。例如始為中國所沒有的金耳飾，又如一種環頭大刀，有的是斯提亞西伯利亞式，有的雖非與中國藝術無關，却是經過朝鮮化的。

已如上述，南朝鮮民族中，混着不少日本人的血液，而三韓中尤以弁朝即任那地方（洛東江沿岸）尤甚。因此，任那便成了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根據地了。而且新羅（舊辰韓的一部）與任那也沒有大異，故自或點說，南朝鮮人種和西日本，沒有大異；文化亦然，可以說是同一個文化團體罷。這些地方的古墳，構造內容一致之點甚多，可以為

其明證(6)。在全羅南道(舊馬韓)的一個地方，又發見了日本九州方面很多的大甕式棺和埴輪的樹物，而其中遺物，也與新羅任那無大異(7)。於是證明西日本與南朝鮮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了。

註

1. 濱田耕作，梅原未治金海貝塚調查報告等。
2. 藤田，梅原，小泉在南朝鮮漢代遺跡。
3. 與(1)同。
4. 濱田，梅原慶州金冠塚與其遺寶。
5. 高橋健自博士銅鉞銅劍研究等。
6. 濱田朝鮮之古墳。關野博士朝鮮古蹟圖譜等。
7. 谷井濟一君朝鮮總督府大正六年度古蹟調查報告。

一一、 原始日本

最後這一節，我想考察日本人的種，敘述其在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的狀態，以結本文。

關於日本民族的入種位置，歷來議論紛歧，唯在學術上，大體已達到不可移動的結論了。日本人種是混合南方系與北方系，一如動物植物兩界那樣，這絕無可疑。屬於北方系的，是和此刻尚存在的蝦夷一樣的特徵的人種；這個人種，合以南方馬來的印度內西亞族的要素，以及朝鮮與中國民族，而成一種混合民族；這自其為島國看去，是大可以有的事。

這種人種的混合，有史以後到現在，也繼續實行着；不過大體上，蝦夷人種和南方馬來人種，恐怕是很古以前就混合，而造成所謂『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換言之，蝦夷之為其基礎人種之一，是無可疑的。但是九州或西南日本，南方人種的分子較多，而在東北日本，則蝦夷的分子居多。至於韓民族及其他之混合，恐怕是在有史以前，所以以為『原日本人』的成立，比一部學者所信者要古得多，大約可以溯到紀元前數百年或上千年。

據我們所知道，他們最初的文明是新石器時代文明，有研磨石器和瓦器。起初大都保持蝦夷人種自北方傳來的技術；到後來，特別是在西日本，復參加朝鮮半島方面的人種文化，遂盛行製造南鮮式石斧或所謂彌生式瓦器之類了。不過在東北日本，蝦夷的人種要素，多年之間佔着絕對多數，中國文化即金屬時代文化的影響，較之西南日本要遲到二百年或數百年；因此，其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反比西日本發達得完全，石器，土器之類，自石器時代之物來說，也頗有完美的。

在這個新石器時代的末葉，中國文化的影響，終於使西日本移入金屬時代，時在西紀第一世紀前後，和南朝鮮一樣。而且這種新文化之先傳於西日本，自其與大陸和朝鮮的地理關係說，是最自然的。自此以後，祝部瓦器的製造，古墳石室之建築，鑑鏡的輸入和做造，金屬利器，裝飾具之使用等，接踵而至；諸如此類，不消說都是受了來自朝鮮半島和大陸的，中國文化或經過朝鮮化的中國文化之影響。其後又經由朝鮮，輸入文字，迎入佛教；接着又移植六朝文化，輸入唐朝文化；但是這裡不說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講演稿。  
一九三〇年二月刀江書院出版。





